

S H E N G Y I N
华艺出版社

声音

一个电视人与观众的对话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

《东方时空》主持人

敬一丹 著

华艺出版社

I253

J908

36022

声音

一个电视人与观众的对话



XWTS 0008895

敬一丹 著



这就是《焦点访谈》的演播室，我们就是在这儿认识的。隔着屏幕，我们好像有点儿远，但观众来信让我们彼此接近，因为这是一种心的交流。大量的观众来信涉及到廉政、法制等这样沉重的话题，有无处诉说的冤情，有无法排遣的苦恼，想到“焦点访谈”来“讨个公道”。所以，有时候坐在这儿，我会怀疑自己到底是谁、到底是干什么的。我心里很清楚，观众写信并不只是写给我敬一丹个人，而是写给“舆论监督”；他们期望的，并不只是《焦点访谈》为他们说话，而是我们国家的法制尽快完善、健全起来。



这是我1995年初到《焦点访谈》时拍下的照片。当时我还没有想到，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遇到这么多事，想这么多问题，收到这么多观众来信。今天，我的心情已经远不像拍这张照片时那样轻松。我把自己在这些日子里所遇到的事、所想的问题、所收到的来信收集在这本书里，是为了让自己记住它们，让有兴趣的观众、读者了解它们。



我的办公桌上永远是这么多的观众来信。我自己看不过来的时候，就请同事、朋友和实习生帮我看。大部分观众的求助，我实际上帮不上什么忙，可我还是尽可能地看信。我不仅仅是为了寻找新闻线索，也是为了让自己和观众、和社会保持直接的联系，为了不忘记观众对我、对我们的期望，为了记住自己是干什么的。





在演播室,我和全国人民一道度过了香港回归的历史时刻。参加“回归”报道,是我作为一个电视人所能经历的最重要的一件大事。但它只是一个瞬间,更多的时候我是在平常的日子里,承担一个电视记者所应承担的责任。这个责任要求我真诚地面对社会,真诚地面对观众。赵忠祥老师曾对我说:“中国第一批电视评论主持人将产生在你们当中。”这“中国第一批电视评论主持人”应该是什么样儿呢?我们在实践着。



《东方时空》的4位总主持人。我们几个人很少有机会同时来到演播室，终于凑到一起拍下了这张“全家福”。我喜欢白岩松的锐气、方宏进的从容和水均益对国际题材的驾驭，喜欢我们在共同的栏目里一起工作的好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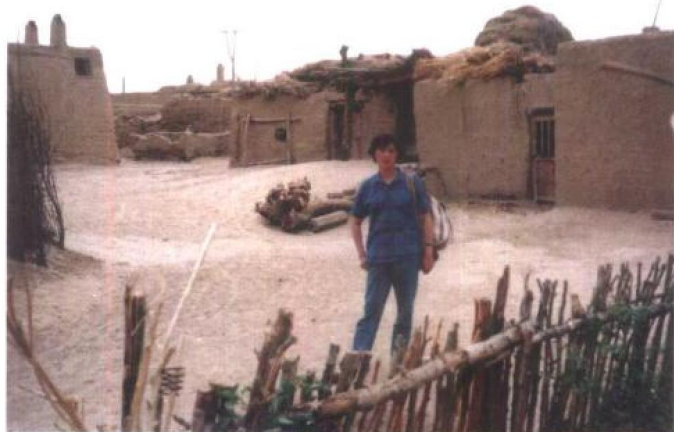
我身后的大屏幕上是中国农村的田园风光。透过屏幕我似乎可以看到,在这一派田园风光里就有手里拿着白条的棉农,就有横行乡里的村霸,就有被外出打工的丈夫抛在身后的妻子,就有为了给《焦点访谈》寄封信而走上几十里山路的庄稼汉……给我们来信的人中,农民是最多的,但往往也最容易被忽视;在观众的声音里,农民的声音最强烈、最迫切,但往往也是最无奈的。



广西都安大山里农民的“土地”，一块地只能种两棵玉米。这是他们的命根子。可一场不大的雨就能把他们这命根子给冲走。



这张照片中间的老太太和最左边她的病儿子，大山里命若游丝的母子俩。分别多年，他们至今让我牵挂不已。我们身后和头顶上的，就是他们家的后墙和屋顶。在都安的大山里，这样的人家不在少数，而且他们还不算最穷的。这些远离我们的、角落里的人其实和我们是一家人，可他们的日子却和我们过得不一样。



沙沙和翠翠就是在这样的院子、屋子里长大的。读者看不到，那些房子后面就是漫漫黄沙，沙丘已经堆到了屋子的后窗下。看看他们住的地方，我们就能知道他们是怎样生活的。看看他们的生活，想想我们的未来，如果环境再恶化下去，将来我们的子孙也许就会生活在比这儿更糟糕的地方。这位老汉的羊在实在没得吃的时候吃过地里的庄稼。等这儿所有的草都被吃光、山变得永远光秃秃的时候，沙沙和翠翠们怎么办呢？



梁晓声(后排右3)、铁凝(后排右4)和我一起把作家们捐的船钱送到了大别山。胡大清老师(后排左1)今后也许再也不用摇着他的木盆到水库沿岸去接送他的学生们了。在他的教室门前照相的时候，他的学生们开心地笑着，而胡老师还是他一贯的那种平淡甚至是有几分木讷的表情。只有在讲台上，胡老师才能让人看到他最有光彩的一面。像他这样的教师正是我们中国教育的“脊梁”。



孩子们的笑脸很灿烂，像六月里的阳光。和他们在一起，大人也天真了些、纯洁了些。我喜欢孩子，爱和他们在一起。孩子们胸前的衣服上写着“手拉手”，他们要拉起手一起面对这个世界。我总想：我们能让他们的笑容很快就消失吗？我们该把他们带进怎样一种生活？我们该留给他们怎样一个世界？



在英国伦敦，格林威治天文台，划分东西半球的子午线上。我的双脚跨越着两个正在共同进步的世界。作为一个记者和作为一个纯粹的游客的感觉并不完全一样：在外面，我看到了一些让我羡慕、让我赞叹的东西。但就像我在这本书里要告诉读者的那样——“东西再好也是人家的”。终会有一天，我会给人家讲讲我们自己的那些好东西，也让他们羡慕、赞叹。作为一个记者，那时候我一定更高兴，一定很骄傲。



观众在电视屏幕上看到我，往往是很严肃、很沉重的样子。有人问过我：“敬一丹，你怎么总是那么沉重，就不能轻松点儿吗？”我回答说，在《焦点访谈》，面对那么多沉重，我很难轻松起来。有位小观众在来信里问：“敬一丹阿姨，我从来没见过您笑。您笑起来什么样儿？”我要告诉这位小观众，这就是我笑时候的样子。其实，我非常想经常在电视上笑对观众。

代序：致观众和读者的一封信

亲爱的观众和读者：

我收到过太多的信，但回过太少的信。这封信就算作回信吧，也可以算作这本书的序。

当每天几十封写着“敬一丹收”的观众来信汇聚到我的办公桌上时，当我拆开它们时，我似乎能听到众声喧哗。每个信封里都包裹着一个声音，各种各样的声音来自不同的地方，来自不同的人生，它们都以直接的、朴素的“原生态”展示着生活的面貌。这声音有些嘈杂，但今天的七嘴八舌比起昔日的异口同声或缄口不言来，不是一种进步吗？嘈杂的声音里也有生动、鲜活、真实的生活。有声音，就需要倾听、回应、交流，把它们编成一本书，让更多的人听到这些声音，不是可以有更多的沟通吗？这些声音是这个年代特有的，因此这本书似乎也有一种记录的意义，它记录着 90 年代后期来自民间的声音，将来 21 世纪的读者能不能从中听到那时不再有的东西呢？我想，到那时，一些词汇会消失，比如“下岗”、“分流”；一些词汇会减少，比如“贫困”、“打假”、“腐败”；一些事情会显得奇怪荒唐，一些事情会显得顺理成章。这就像我们看 50 年代、60 年代的事儿一样。我常想：如果有谁留下一本 50 年代、60 年代的群众来信（读者、听众、观众）集，那读起来一定是很有意思的。《焦点访谈》、《东方时空》是一种交流和记录，这些观众来信和一个电视人读信时想到的，是另一种交流和记录。

我常常感到愧对观众的托付。给我写信的观众多半是最需要帮助又最缺少沟通宣泄渠道的人。他们也许在灯下犹豫很久才写出压在心底的话；他们也许是找了村上识文断字的人代笔；他们也许走了几十里山路才找到一只邮筒。有的观众落款写着：信任你的人。我知道，这信任不是对我个人的，而是对电视台、对我们节目的，我是作为一个代表承受这托付。被托付就是这样一种沉甸甸的感觉。有人说，电视人、电视节目主持人很容易飘起来，可这些来信就像一根根线牵着我，让我与一个个角落千丝万缕地连在一起，怎么飘得起来呢？然而，我尽我所能又能为人家帮上什么忙？我只是一个电视人。我只能心怀歉疚地面对观众。

我曾经面对着这些信，看也不忍，不看也不忍。除了把信作为节目线索和转给有关部门，我还能做些什么呢？有一天，我的同事李玉强坐在我桌子对面说：“你有没有想过把这些信编成一本书？”顺着这个思路我们找到了一种方式，在责任编辑沙洲的全力推动、操持下，渐渐地有了这本书的模样。

处理成千上万封的观众来信要用大量的时间、人力，在最紧张的时刻，北京红绿蓝影视广告中心的朋友在杜禹的带领下一如既往地伸出援手；北京市久久文化公司的朱宝东、姜华、张羿、石莉莉和华艺出版社的金丽红、黎波等朋友为这本书付出了大量心血；北京广播学院的实习生毕竟成等也常来帮忙。这本书其实是大家的。我永远心存感激。

敬一丹

1998年4月27日

关于观众来信的说明

在这本书里，我们大约选登了 150 封左右的观众来信，还不包括在文章里间接引用的。这些来信中最早的一封来自 1995 年 7 月 9 日，1995 年的来信只有两封；最晚的一封来自 1998 年 3 月 20 日。大部分来信的时间是在 1996 年底到 1997 年底之间。可以说，这些观众来信所反映的，是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现实。我们选择来信的原则是：反映的问题较普遍，在来信中同样的问题反映较多；有比较具体的事例；相比较有一定的文字水平；对问题有一定的认识、见解。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不可能对所有来信逐一核实。所以，在选登来信的时候我们隐去了人名、地名，既为了保护来信的观众，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议。作者、编者在此郑重声明：请不要“对号入座”。

此外，在最后一章和其它某些段落，部分观众来信我们保留了观众的署名。因为我们根据信的内容，确信这样做不会对来信人造成什么伤害。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我们无法逐一与这些观众联系并征得他们的同意。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歉意。

最初，我们的设想是每篇观众来信都引用全文；错别字和病句原封不动，用【 】在后面改正。这样做的初衷是完全保留来信的模样。后来，在写作、编辑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样做有一定